

● 出版学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王建辉

(湖北省出版总社,湖北武汉)

[作者简介] 王建辉(1957-),男,湖南武冈人,湖北省出版总社编审,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思想文和出版史研究。

摘要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到 20 世纪的 30 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着重从 30 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关键词] 近代思想文化;近代出版;出版物;1936 年

[中图分类号] G 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710-05

30 年代之初中国的图书市场行情并不看好。此前的几年,世界经济危机横扫全球,到 30 年代前期,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对于出版业而言危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对上海实施轰炸,上海出版业“无一家不受损失。损失的总数,大概占总财产的 60% 以上”^[1](第 279 页)。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一次极为严重的摧残。但是,正是这些刚刚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战争摧残中走过或者尚未完全走出的中国出版业,此后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次辉煌,走进了近代以来的一个高峰年代。

一、多种类型的出版格局

中国的出版近代化走到 30 年代中期,出版社数量虽然还有一定增长,如新建有上海新文字出版社(1936 年),竞文书局(1935 年),但中国出版已经走过了数量增长的狂涨阶段而到了一个产生新质的阶段。在这个年度新创建的出版社并不是太多,但新创建的出版社中在后来留下影响的出版社却有好几家,如新知书店(1935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 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 年上海,后改称读书出版社)等。

中国出版社格局在这时已呈现出多元性特点,出现了几种类型成为中国出版的主干和代表的出版社。

1. 商业性民营出版机构 商业性民营出版业是 20 世纪初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出版业主体的。作为民营出版业,多数是商业性的。这样出版社就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二者的调和程度。商务、中华这样老牌的出版社,在商业化时代都注重文化的经营。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创造了商务新的辉煌。中华书局在 1935 年新建成澳门路新厂,扩大了生产能力,并将图书馆和编辑所一同迁入,加强了图书馆建设,使自己的实力直逼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一般的中小型出版社都是商业型民营出版社,民营的商业性出版社成为中国近代出版的主干。

2. 以人文理想为纽带的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在这一年创办的,充满理想色彩的吴朗西和巴金的结合,使这家实力并不雄厚规模也不算大的出版社成为凝聚着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出版机构,它和一般的商业性出版机构不同,带有同人性,是一家是以义务劳动为形式的同人出版社。在一个正在

商业化的时期,像进步的生活书店也不能不考虑生意上的经营,新办的文生社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理想,是一群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出版探索人生理想、实现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出版劳作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以进步事业为追求的左翼出版社 读书、新知等几家书店建立后,与前几年建立的生活书店一起,在多种资本竞争的夹缝中奋斗,汇集成出版的左翼力量,进步出版事业规模扩大,成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堡垒,表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出版业开始挺进到出版的前沿地带,并在内部管理等方面形成中国近代出版的新类型,对于社会各阶层和一般民众的影响也空前加强。而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新政治格局也已尘埃落定,西北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也正在新的开始,和出版中心上海的进步出版事业形成遥相呼应的局面,成为后来新中国出版的源头之一。

30年代中期,近代以来的中国出版大格局开始形成。中国出版的大格局,是由多种类型的出版小格局构成的:一是经营规模不同的大中小格局,二是经营方式不同的商业文化格局,三是资本来源不同的官方与民营格局,四是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左中右格局,五是空间地域不同的中心和次中心格局。以大中小格局论,30年代在上海的书业包括出版社印刷厂大概有百余家。除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六大出版业外,其余是些中小型出版业。由这一格局看,中国近代出版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借市场之手完成了“出版集中”的过程;从商业文化格局看,文化生活出版社提供了另一种文化的理想典型,商务印书馆将文化作为一种商务来运作,让文化充满商业精神,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商务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来操作,让商业活动充满人文关怀,两者是商业与文化的一种逆向操作;从官民格局看,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此前两年建立,在官方力量支持下,对民营的如商务、中华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一势头从这个年度开始在以后的发展中愈益明显,尤其在教材出版方面正中迅速挤占商务、中华的份额,试图控制教科书出版命脉。1936年教育当局厉行“国定教科书”规定,各教科书都受到审订并划分市场份额。正中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得到等额。再如官办的军用图书出版社,1935年所出版各类军事书籍占当年全国同类图书的45%强^[2](第252页);以政治倾向言,出版业的左、中、右倾向基本明朗,右的是官方书业,中间偏左的如开明出版社,一些新出版社异军突起,其中主要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生

活书店等左翼力量。当然也有一些出版社政治倾向并不明确,如黎明出版社出版物中左的右的都有,反映了无一贯政治立场的摇摆状态;以空间地域论,上海绝对地成为中国出版的重镇和中心,在江苏、安徽以及湖北等地则成为次中心。

二、迅猛增长的出版物总量

出版物的量总是出版业规模和繁荣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仅北京、上海、重庆3家图书所藏1911—1949年各类中文图书计124040种。根据这个书目来统计,民国时期出版新书最多的年代为抗战前夕的1933—1936年。以语言文字类作抽样统计,这4年都超过200种,其中最多的是1935年,达300种以上,其余年份都未超过200种。这还是据3馆藏书的统计,所藏图书和所出图书是两个概念,统计数目并不一致,所出书一定比这个数目还要大,或许还要大得多。但这个统计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

对于中小型出版社来说,1935—1936年是高峰年,如30年代初建立的黎明书局,是以复旦大学一批教授为背景建立起来的颇有一些特点的出版社,据书局中人回忆,1936年是书局旺盛时期。这些中小出版社对全局影响不大暂不多论,且以商务、中华两家为例。

就出版物的量而言,中国最主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自创建以来出书最高峰年代在1934—1936年,这几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量占到全国的出版物总量的一半,1936年更占到全国的52%。商务30年代上半叶的出版量如后:1930年957册,1931年786册,1933年1430册,1934年2793册,1935年4293册,1936年4938册。基本上是逐年增加的,1934年比1931年增长4倍,1935年比1934年成倍增长,1936年比1931年增长6倍,最高点在1935—1936年。

中华书局是1912年成立的,在民国时期共38年中,1935—1936年是中华书局出书种数和册数最高的两个年份,第一高峰是1936年为1118种,第二高峰为1935年459种^[3](第47页)。

可见中国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在1935—1936都同时达到了各自出版物量的最高峰。由于出版规模增大,商务印书馆在30年代更有世界三大出版业之称。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民国时期38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出版图书3264种。以全国历年平均值

和商务一家最高值对比,商务一家在 1935-1936 年的年出书量就已远远超过全国历年平均值数。而商务的产量还只占到这个年度全国的 52%,1936 年全国的出书量是 9 438 种。中华书局 1 548 种,世界书局 231 种,加上商务的,3 家出版社占全国的 71%^[4] (第 406 页)。

又据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的统计,从 1927 年到 1936 年,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之和,以及全国的年出版物总量是:

| 年份 | 三家出版量(册) | 全国总量(册) |
|------|----------|---------|
| 1927 | 1 323 | 2 035 |
| 1928 | 1 569 | 2 414 |
| 1929 | 2 064 | 3 175 |
| 1930 | 1 823 | 2 806 |
| 1931 | 1 581 | 2 432 |
| 1932 | 986 | 1 517 |
| 1933 | 2 263 | 3 481 |
| 1934 | 3 786 | 6 179 |
| 1935 | 5 762 | 9 233 |
| 1936 | 6 717 | 9 438 |

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以及王氏的统计,就出版量而言,1935 年尤其是 1936 年确乎是中国出版的一个高峰年。如此大的出版量至少说明:一、中国的出版业在当时世界并不太逊色,就其时的国力来说已是不错的业绩;二、巨大的出版量大大地强化了出版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功能,导致一个以阅读为中介、以阅读公众为基础的近代公共领域的出现;三、由巨大的出版物消费量创造的如此大数量的读者,对社会和文化的幅盖与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四、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出版业的高涨。

三、成为时代标志的出版物

有影响的出版物,是出版达到高峰年代的质的标志,是这个年代的出版对于后世的遗赠。有影响的出版物是就其内容含量与市场接受而言的,在内容含量方面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结晶,在社会接受方面是社会大众接纳的产物。出版有影响的出版物,是出版人的一种高智能的劳作与追求,其出版物本身也是出版人永恒追求的文化符号。中国学术文化和出版业的并行发展,到这个年代应该是收获季节了。

中华书局出版编纂《辞海》,1936 年对外发售预约。此书经过 100 多人先后 20 年的努力始告完成,计收字 13 000 余个,收词 10 万余条,是一部百科全书

书式的工具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的经典,代表了中国工具书编纂出版的水平,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当代水平,对于当时的文化发展以及后世的影响最为巨大。

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 1917 年至 1927 年 10 年间的文学总集,分别由鲁迅、茅盾、郑伯奇编选小说 1-3 集,郁达夫、周人编选散文集 2 集,洪深编选戏剧集,朱自清编选诗集,郑振铎编选理论建设集,阿英编选史料索引集。这部书值得肯定的,一是不论是从当时还是从历史来看,编选者都是国中一时之选;二是这部书乃是对新文学的第一次大结集和集体审视;三是出版的创意和操作,使这部书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名牌,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对它的模仿之作。

文化生活出版社在 1935 年成立,当年就推出 3 套重要的丛书,即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文学丛刊》和鲁迅、茅盾主持的《译文丛书》。其中《文学丛刊》是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一次大集合,从 1935 年推出至 1949 年共出版丛书 10 辑 160 册,而 1935 年到 1936 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出版了 3 辑 48 册,差不多占 1/3,而丛书的主要的和重要的作家都包括在内了,以后的 13 年出了 112 册。这套书不仅是我们所论的这两个年度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也不仅是文化生活出版最重要的一套丛书,而且也是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大型丛书之一。对于文生社这样几套丛书,当时人和后来人评价都很高,今人钱谷融说,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和出版史的一件大事。

生活书店是以出版杂志起家的,1935 年出版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其前身是《生活》周刊,《生活》被禁后改出《新生》周刊,因新生事件同样被禁,改出此刊)每期发行高达 20 万份,次年被查禁而改名《永生》,由金仲华主编。生活在这个年度也出版了不少好书,《世界文库》从 1935 年 5 月开始出版,它既是一部丛书,大约是受了上一年“杂志年”的影响起初也做成一种类期刊(每月出版一册),这是由郑振铎主编的,其发刊把中国融入于世界之中,真正体现了世界性。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日趋成熟。在关于生活的出版物中,由茅盾主编、孔另境助编的《中国一日》1936 年 9 月初版,也曾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刊在刊出征文启事后不到三个半月,读者来稿达 3 000 篇以上,字数不下 600 万言。经过编选,用了 100 篇,约 80 万字,800 多页精装一厚册。文章的内容是选定 1936 年 5 月 21 日这天,请全国各地读者写一笔记述当日当地发生的

事情。3 000篇稿件中,来自全国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而外的所有省市,除了僧道妓女及“跑江湖的”等特殊“人生”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来稿中占一位置,而且还有侨居在南洋、暹罗、日本的赞助者的来稿。这次征文和此书出版,开创了一日型的书报刊形式,更使出版成为一种群众的活动,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开创了出版和群众结合的新形式。

老牌的商务印书馆在 30年代对丛书出版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此时除了正在陆续出版的《大学丛书》外,1935年辑印《丛书集成》,这是一部“丛书的丛书”,是规模相当庞大的古籍出版项目,这年 3月宣布刊行,这样大的工程不到半年就推陈出新出版了第一批,随后陆续出版,这样一种出版的大制作标志着中国的古籍整理与出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商务在 1936年还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辑出版计划,延至 1937- 1939年共出版 2辑 40种 50册。学术界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这套书是由编辑出版者策划的,王云五为了出版这套书,曾对国内外的文化史研究现状作过比较研究。这样一套书,在 80年代由上海书店影印,世纪之末,商务印书馆再次横排重版。其生命力久长无庸再说。

其他有影响的出版物还有北平好望书店发行的《古今同姓名辞典》,世界书局 1936年出版的《世界人名大辞典》等。还要指出一类图书,即书目图书,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全国出版物总目录》,生活书店出版了平心编《生活全国总书目》。后者编例称,编印这个目录是因为“国内至今尚无一部收罗全国新出版物之完备书目,实为学术界、图书界一大缺憾”,而读者“每苦无一全备书目为读者购书指南,而出版界又无法将所有出版物介绍于全国读者”。其主要志愿,“倒是广大读者殷切的热望与自己实际的需要”。“读者的热望”体现了生活一贯的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自己的需要”表明这种供销售使用的书目书的出版,说明生活书店开拓全国市场的销售努力以及全国图书市场的形成,也说明出版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在 1935年重印《新青年》是一种象征。蔡元培 1935年 8月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胡适也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

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热烈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51](第 184页)这种象征的意义,是表明新文化运动经过一个过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表明 1935- 1936年这个出版高峰年代和新文化运动的天然和必然联系。

四、好景何以不长的余论

对于出版史来说,1935- 1936年还有许多值得写进历史的重大事件。1935年鲁迅和生活书店为了《译文》的合同发生了意见分歧,生活书店出于出版经营方面的考虑而撤换年青人黄源的主编职务,提出要鲁迅任主编,由于生活书店在操作方法的不妥而未能获得鲁迅的充分理解,导致中止合同,《译文》杂志停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它说明在一个商业化时代出版社在市场化经营方面的强化与作者意愿间的矛盾冲突。1936年王云五在商务实行开架售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表明中国出版在接近世界通行规则走向世界,受此影响,上海杂志公司在抗战初期撤到汉口后对新书刊全部开架售书。从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出版与思想文化方面重要的信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高峰年代也有一定的负面。第一,造成中国出版不景气的因素始终存在。中华书局的创建者陆费逵曾在 1932年抱怨:“现在一般舆论,总怪无好书出版,但是在现在教育状况、经济状况下,要出好书,实在不容易。”一位叫金爪的人在 1935年 5月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出版界的不景气》。可见 1935年出版不景气还没有完全消除。第二,中国出版物结构门类的不平衡现象并没有消除。第三,在出版业中还存在大量的弊端,如编辑工作草率,稿件不及审理也不经校对,如一折八扣书的流毒仍然存在。第四,出版业资本规模不大。这虽是说的战前普遍情形,在此高峰年代出同样是存在的。第五,由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当局对出版的控制也在加强,1935年《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加上“妨碍中日邦交”罪名遭禁,主编杜重远被判处徒刑 14个月,1936年 2月《大众生活》被封,1936年通令查禁社会科学书刊 676种。也是在这个年代,出版界反对国民党当局对于出版事业的控制的斗争开始加强。

这一个高峰年代的到来并不是平地一声雷,形成 1935- 1936年中国出版一个高峰的原因,一是中国新出版经过 30多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积累,自晚清以来中国出版业崇步维艰,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出

版业总算是大浪淘沙,终于或者说“勉强站住了”。《辞海》的出版过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种积累过程的艰难和漫长,如旧《辞海》的“编印缘起”所说,“亘时二十年之久,亦可谓艰巨之业矣”。同时近代以来经过新文化洗礼的新一代编辑出版人才整体成熟了,达到了创造才华的高峰;二是中国文化的发展,3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化在各方面都有较大进展的一个高峰年代。1935-1936年是中国在1949年以前有图书馆最多的年份达5000多所,也是有各类学校最多的年份^[6](第6-9页),图书馆和学校的急剧增多直接刺激出版业的发展,这对出版业的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新文化和左翼文化更得到长足发展的年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这就为出版业提供了数量较为充足的读者和作者;三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中国没有被裹挟进去。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还在释放能量

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中国近代出版业或许会沿着旧有的轨迹持续发展下去,产业之光或许也是有的,但是中国出版的这一高峰的晨光好景不长。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中国文化

已然呜咽,中国左翼文化痛失旗手,同年商务印书馆创业元老高梦旦逝世,也预示着出版业一个轮回的结束。次年中国上海“八一三”沪战爆发,中国近代出版业受到战争的更重大摧残,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中国出版将进入一个艰难时世。于是,1935-1936年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出版高峰的一个历史绝唱。

参 考 文 献

- [1] 张静庐.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2] 钱文华. 江苏图书编辑史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 [3] 王余光. 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 [4] 姚福申. 中国编辑编辑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 [5] 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 [6] 王余光. 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车 英)

China's Modern Publication in 1935- 1936

WANG Jian-hui

(Hubei Provincial General Press,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Jian-hui (1957-), male, Deputy head, Doctor, Hubei Provincial General Press, majoring in modern history of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history of publication.

Abstract Through 50 years or more hard development, China's modern publication entered to the highly developing period in the middle of the 1930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dern publication by using micro-view points in the macro-view.

Key words modern ideological culture; modern publication; publication; 1936